

思想政治工作,毋庸讳言,在历史上,在冷战时期,在国内国际两大阵营曾经长期对立的另一方,被称为“心战”等等。这些词汇听上去冰凉,充满贬义,但每一个稍具语感的人,都能从中领略到命名者深藏的无奈和恐惧。翻开近年来部分解密后的《蒋介石日记》,你会惊异地发现,几十年间老蒋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诅咒共产党“宣传之深入”,哀叹其简直已经到了化腐朽而为神奇、点冥顽竟至灵怪的地步。那些曾与共产党誓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蒋氏铁杆,最终有多少拜倒在共产党的主义、主张和政治优势之下啊!难怪毛泽东早在红军时代就借手下败将、国民党赣军主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之口,不无自豪地写道:“杨池生的《九师旬刊》,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‘毒矣哉’的惊叹。”而这种“毒矣哉”的办法,在江西长冈乡民众那儿得到的反响,则是把80%的青壮年送入红军的踊跃之状。乡民们告诉毛委员:“共产党真正好,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。”

往事久矣,也许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对我们传统的、正宗的、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,有着无穷战斗力、征服力和向心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淡忘了,隔阂了。许多人经常面对的,是一大堆被修正了的、空话套话假话官话连篇、越来越虚的公式概念化的说教,天长日久,怎能不避之唯恐不及?年轻的一代,甚至压根儿搞不明白,原生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个什么东西,究竟神奇在何方。

建议您,不妨再重温一下毛泽东当年的原始论述,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源头处稍涉兜游,掬一捧灵动的水花濡湿你的眼瞳,相信那将是一次深入浅出、生动风趣、毫无八股腔的思想还原和审美戡乱。它会告诉我们,这位开天辟地的革命者,为什么在将少兵稀、弹匮粮乏的时候,为什么在压

力重如泰山没顶、连基本生存都频频告危的时候,偏偏认定思想政治工作,是“红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”,而非金钱、关系或权力。

1928年严冬,毛泽东在井冈山寒气侵人的茅屋里就着炭火,伏案挥毫,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《井冈山的斗争》。面对“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”的事实,再次强调了红军创设的一条成功经验:支部建在连上。这个“连”,泛化开去,显然未必实指军队的连级建制,而是借代一切相聚了若干民众的组织机构。

这个建在“连”上的支部,并非仅仅选一个书记,收几个铜板党费,定期过过组织生活而已。它,要督促官兵进行思想政治训练,指导士兵开展民运;它,要监督实施军内民主,官长不得欺负士兵,士兵有自由说话的权利;它,对经济公开尤其不肯马虎,哪怕从每日五分钱的柴米油盐钱中结余出的一点零星的“伙食尾子”,也锱铢必较,容不得藏掖……

点点滴滴,极尽凡庸,但无不与“程序正义”相关,无不以底层导向为彰显,向心之力沛然勃发,何愁导不出一个红军所追求的必然结果。

继井冈山之后,1929年12月,暂避福建上杭的红四军,乘强敌之隙召开世所闻名的“古田会议”,一条最终催生了新中国的伟大原则落地生根: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。此线以心脑为经纬,静以缚魂,动以追魂,一朝挥舞,摧枯拉朽。

有人以为,战争年代的策略选择,和它的创造者一样,如今俱已老去。此话貌似新潮,实则大谬。红军的时代虽往矣,但其固守的正义优先的基本价值观何尝过气?比如民主管理、官兵平等,比如顺民意、解民瘼、安民生,再比如经济公开,公帑透明,尤其防贪杜腐,哪怕再过五百年也将常温常新,为民所祷。

八十余载光阴遽逝,这条承载着传统政治优势的生命线,于今风尚尚健否?

舞动的生命线

姜龙飞



怎样做个好医生

张进

怎样做个好医生?这一古老的命题,从有了医生的那一天起,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。四十年的医院临床工作,让我体会到要做个好医生除了医术精、医德好之外,还要和患者多多沟通,尤其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,如果再讲究些医患沟通的技巧和艺术,那么,不仅能让患者满意,也会使自己对从事的职业有一种成就感。

记得一位50岁的女士因为突然发生脑出血入住我们神经内科,患者生命垂危,当时在抢救中出现了治疗上的矛盾,脑出血治疗的原则是要用止血的药物,但是我们发现患者还存在右下肢“深静脉栓塞”的病症,深静脉栓塞的治疗原则是停用止血药物而应用活血药物。怎么办?我们多次和患者的丈夫谈话,取得他的理解和配合,在采用中性药物治疗的原则实施救治一周后,患者病情好转,最后康复出院。

但是现代医疗水平常常也会无力回天,做医生的真的感到非常无奈。有一天,一对30多岁的男女来找我,那女子热泪纵横,朝我屈腿跪下。我大吃一惊,赶紧伸手相扶。原来他们是我救治过的一位脑梗塞老太太的女儿和女婿,老太太因为高龄,大面积脑梗塞,合并心功能衰竭,抢救无效而死亡。终止抢救后,老太太女儿对我们为老太太所做的一切表示理解和感谢,她一定要代替母亲亲向我跪拜表示内心的感激之情,她说因为医生在为老人施救的同时,多次和家属谈母亲的病情告知治疗的情况,虽然他们不懂医学,但是通过和医生的沟通,能够理解医生并不是万能的,医生已经做了子女没有能力做的事情。听了他们的话,我很震惊也很感动,有这么好的患者和家属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与患者或者家属沟通,取得他们的理解和合作呢?

医生在全力救治病人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家属的感受,以及作为患者最亲的亲人对抢救过程的承受能力。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是语言的沟通。医生和患者以及家属是一条战壕的战友,我们要齐心协力,一起用挚爱换取患者生命的回转。

医生不仅是医生,更是社会人。做一位好医生,需要几十年如一日把主要精力和心血花在为患者诊治和科研上,不断进行知识更新。医学作为一门科学,存在着不确定性,而从从事医学的医生也有作为人的局限性,需要不断探索许多未知之事。同时,我们也不能忘记尊重患者,尊重患者家属,这样才算是好医生。



边看边聊

去迪拜前,有人说:“一个沙漠城市有什么好玩?”但我飞抵迪拜后,才知这座城市创造了诸多“世界第一”,还真值得旅行者光顾。

在迪拜游览,随处可见“世界第一”,如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园、最大的滑雪场、世界唯一的水底酒店,以及世界上最昂贵的赛马比赛。我在黄金街看到一枚重64公斤的超大黄金戒指。这枚戒指是55位工人用45天时间打造的,戒指周长2.2米,戒指上镶嵌了615颗水晶,创造了“戒指之最”。

最吸引眼球的Burj Al-Arab Hotel(亦称帆船酒店),它位于人工岛上。英国设计师异想天开用250根基建桩柱打在40米的深海下,动用了9000吨钢铁,将酒店外形设计成一张鼓满了风的帆。酒店共计56层,高321米,是目前全球最高的酒店。由于七星级酒店不提供付费参观,为一睹“庐山真面目”,我们便在帆船酒店用了午餐。

帆船酒店依海而筑,在蓝天、白云、碧浪的背景下,一艘银白色的帆船样建筑物映入眼帘,我们步入顶高180米的大厅,满眼都是金光闪烁,这座用26吨黄金打造的酒店,让客人面对富丽堂皇的梦幻天幕。这里有9个大餐厅,

其中最有名的是“海底餐厅”,大型水族箱内的珍稀海底生物与你共享午餐。我们经过一个小时排队,被安排在亚洲餐厅用餐,有中国菜肴、日本料理、韩国烧烤,还有东南亚风味小吃。当然,让人享受的不仅是美味佳肴,更是一种令人心醉的中东情调。听服务员说,帆船酒店每个房间

在迪拜领略“世界第一”

曹正文

都是上下2层的套房,在第28楼有停机坪,今天有不少体育明星乘机前来享受。

比帆船酒店更壮观的是哈利法塔。哈利法塔总高828米,为世界第一主楼,比我去过的吉隆坡双塔(高452米)、台北101高楼(高508米)要高很多。从外形看,那一幢以金属和玻璃为外立面的建筑,造型如一根银针直插云霄,异常雄伟。我们原来是买团队票,仅60美元,但没订到,于是买了100美元个别墅,先经过一条动态银幕,然后乘电梯,电梯速度为每秒17.4米,只一分钟时间,电梯便把我们送上123层楼的观景台。

在观景台上向四周俯瞰,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人工棕榈岛。

棕榈岛,号称“世界第八大奇

迹”。在波斯湾上,迪拜人用“人工填海”的方式,建成了三个以棕榈形造型的人工岛,第一个朱迈拉棕榈岛始建于2001年,有4000栋洋房和别墅。第二个杰布阿里棕榈岛于2002年动工,除别墅,还有4个水上主题公园。第三个德拉克棕榈岛于2004年动工,这个人工岛在主干上伸出18支叶脉,创下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纪录,岛屿的面积大于巴黎,将于2015年完成。我们在空中展望那棕榈树形的人工岛,叹为观止,以人工填海的形式建岛,始于古代,但迪拜人工岛规模如此宏大,造型如此精致,确实是人类奇迹的高度体现。

听工作人员介绍,哈利法塔37层是世界上首家ARMANI(阿玛尼)酒店。45层至108层则是公寓,共有1000套豪华公寓。在哈利法塔上浏览,让我感受到沙漠中创造的种种奇迹,特别让我想起在坐轻轨看棕榈岛,那是世界上第一部无人驾驶的列车,在轻轨上近距离看棕榈岛,在哈利法塔上远眺棕榈岛,这两个项目可谓相得益彰。

哈利法塔的下面四层是一个“购物天堂”,也是迪拜最大的百货公司,逛一天是远远不够的,还有一个海洋水族世界,让你仿佛置身海洋深处,任各种鱼类游在你的身边,真的很有趣。



租界的「地火」

罗浦才

“地火”,是19世纪70年代上海人民对“煤气灯”的一种俗称,在1874年民谣《竹枝词》中,华人曾以“火树银花不夜天,行人如比梦游仙”来赞美租界中“地火如林”的夜景。“地火”,在晚清的上海成为“十里洋场一景”。而与租界一步之遥的老城厢华界地区,则仍然点着油灯,直到40多年后的民国初年,电力进占上海照明市场,煤气也开始转向拓展民用灶具领域。20世纪初,通过煤气管道的“灶具”、“取暖炉”、“热水器”等进入租界的市民住宅公寓、花园洋房,成为高档家庭的“宠儿”。他们会自豪地对烧煤球炉的人说,“我们家里是烧gas(煤气的英文名)的”。“煤气灶”和“抽水马桶”成为当年“时尚民居”的必备设施。最早的“煤气灯”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,它曾取代了城市街道和家庭的照明。1865年12月18日夜,从南京路外滩向西至河南路试装了10盏煤气灯,它照明亮度强,使用清洁,受到了公众的欢迎。第二年英租界中心区,即在苏州河以南,黄浦江以西,共有175盏煤气灯齐放光明。不久,又在虹口地区发展了“煤气路灯”。而日本横滨于1872年9月才启用了第一盏煤气灯,比上海迟了6年多。

元宵灯谜

朱彬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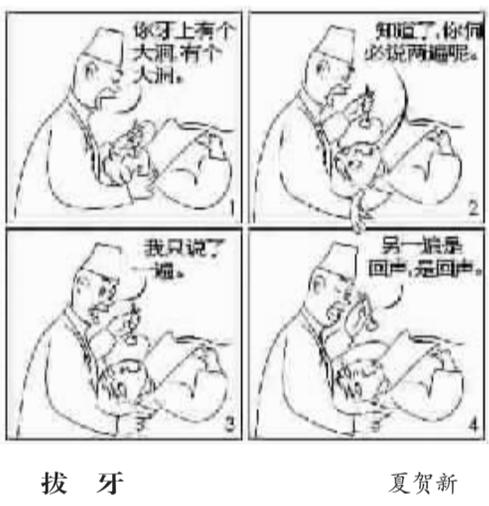
一叶扁舟映眼帘

(四字足球用语)

昨日谜面:独立操作

(二字期货术语)

谜底:买单(注:单,一个)



拔牙

夏贺新



小时候,我体弱多病,面色萎黄,瘦得很“骨感”,十足像“一杆柴杆”。因为体弱,也就多病,医院进进出出,成了家常便饭。老来得子,父母十分宝贝我,父亲总想给我找个好大夫,于是,就有人给父亲介绍了简医生。

简医生是台湾人,日本医学博士。他的私人诊所坐落在华山路上一条一排花园小洋房的弄堂里。楼上是简医生的寓所,楼下是他的门诊室。简医生中等个头,四十来岁,脸庞消瘦,面色白皙,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,脑门因为有点秃显得特别宽阔。简医生在给人看病前,总是先用脸盆里淡红色的药水仔细反复地洗自己那双手指修长的手。每次他给我打完针,都会竖起大拇指,在我面前晃上几晃,然后用带着浓重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:“唔,勇敢,勇敢。”有一次,

号头纸,别说外省人听不懂,现在的上海小囡也不知其为何物。号头纸乃上海方言中日历的表述语。上海人把“1、2、3”等阿拉伯数字统称为“号头”,印有日历的纸片自然就叫“号头纸”鄙人每日临睡前的一件事,便是撕去当天的那张号头纸,心里默念着“又过去一天”,这一习惯已保持了大半辈子。

说来,旁人也许不信,我这一习惯还是儿时跟着祖母养成的。祖母不识字,却能识别“号头”。老人家忙碌完一天家务,临睡前,撕去一片号头纸。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:“又活了一天。”老人家虽然能识别“号头”,但要了解农历节令,还得求助孙辈。我是孙辈中最乐意

我大概好几天没吃东西,简医生要给我注射一些葡萄糖。我看见他将好几支葡萄糖液抽入粗大的注射器里时,便又哭又闹,说什么也不肯把胳膊伸出来。这时,只看见简医生向上推了一下注射器,针头射出一条抛物线,简医生张开大嘴,用嘴接住了落下的抛物线,然后,

华山上简医生

王淑权

他哑哑嘴,睁大眼睛看着我:“唔,你看,这是可以吃的,可以吃的!”我被简医生这个滑稽的动作逗得笑起来,在他的连哄带骗之下,伸出细细的胳膊,让简医生把那一管“可以吃的”药水推进自己胳膊的静脉里。

帮助奶奶查阅农历的。只要奶奶一发问,我便看着号头纸上农历节令的记载,向奶奶报告,“阿奶,再过三天要冬至了哦。”“阿奶,再过两天是立春了。”奶奶便会说出许多节气农谚,诸如“立春天气晴,百事好收成”、“立春之日雨淋淋,阴阴湿湿到清明”等等。那些农谚成为我节气知识的启蒙。

童年岁月里撕号头纸充满着快活,希冀的是每个年节的到来。因为,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节日意味着改善生活。四月立夏吃草头面饼、五月底午吃粽子、七月半吃塌饼、八月半吃月饼、正月十五吃汤圆。最期盼的是大年三十的那顿年夜饭。猴急了一年的“饭榔

大概在我上小学时,正是公私合营的尾声,简医生也未能留住自己的私人诊所,被“合营”到了一家区级医院当内科医生。他的收入和生活自然大不如前,再加上医院里的复杂人事,简医生当时失意落寞的心情不难想象。可能在“大鸣大放”时,他发了点牢骚,不但被打成右派,而且被关进监狱,没过几年竟病死狱中。

我出国二十余年来,中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昔日自己熟悉的建筑,已被象征着财富的摩天大楼所取代,但简医生住过的那条在华山路上的弄堂,却在轰轰烈烈的市政建设中得以保留。看着小楼上的一扇窗户还亮着淡黄温馨的灯光,我在想:简太太是否依然健在?他们的那双漂亮儿女如今也都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
撕号头纸

姚志康

成家后夫妻分居两地,撕号头纸浸透着聚散离合的欢欣与凄愁。接近探家的日子,心情随着撕去的日子,一天比一天兴奋;到家后,兴奋随着号头撕去,又复归无边的相思。还没热乎够,又得两分离。

在撕号头纸的漫长岁月里,女儿呱呱坠地;女儿蹒跚学步;女

儿上完小学上中学;上完中学上大学;上完大学去上班。在日复一日的撕号头纸中,我和妻额头增皱纹,华发添白发。

前些年,盛行挂历,许多人家不再使用日历,可我每到年终总是叮嘱妻子别忘了买号头纸。我不习惯看挂历过日子,喜欢在撕号头纸中一天天过去,似乎,惟如此日子才算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我喜欢撕号头纸,还有一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之意味。临睡前撕去当日号头纸,便会回顾一遍当日所做之事,如有欠缺,便会提醒自己明日要去弥补,顺带又想着明天还有哪些紧要事项处置。不如此,我会睡不安枕。



赏心乐事